



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 研究背景

1. 何为会馆

会馆是什么，它出现于何时？为什么要研究会馆？云南与会馆有什么样的联系？这些都是本书开篇需要解答的问题。

人们对会馆最直观的认识，是现今依然悄悄静立在中国各城乡中的一座座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色、供奉各地民间信仰神灵的祠庙。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祠庙后面隐藏着其建造者所组成的团体组织，才是会馆的本质，也是本书所要研究的对象。会馆最早出现于明代的京城，清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移民活动的推进，会馆遍布中国大中小商业城市，甚至是中国商人所到的海外城市中也有它的存在。城乡中那些具有地域信仰特色的祠庙则是会馆成员祀神、聚会和相互联络的地方。它是同乡人士以地缘为纽带或同业人士以业缘为纽带，以祀神、聚会和推进业务为目的而建立的民间组织；它是一个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组织，它将祀神祠庙与组织办公地合二为一，形成“馆庙合一”的组建特色；它还将“天人合一”“乡情”或“业缘”等传统文化因素融入组织内部管理中，成

会馆具有实体建筑和团体组织两重含义，本书虽然也介绍作为实体建筑的会馆，但更侧重于后一种的含义。在正文中具体论述何种含义上的会馆由各章节内容确定，此处不一一注明。



为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约束力的社会经济组织。

2. 明清会馆

之所以要研究会馆，是由于会馆与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与明清时期中国高速发展的商品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美国著名汉学家罗威廉(William T. Rowe)在《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谈道，自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中国开始了较宋朝商业革命幅度更大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商业化最广泛地扩散至地方乡村社会。罗威廉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商业革命的发生时间是明代嘉靖朝至清代乾隆朝时期。当然，这段时期内中国商品经济并不是一直呈直线上上升趋势，也有萧条时期，事实上中国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只是16世纪中期以后的数十年以及18世纪。在此期间，“大量中国农业家庭将自有之相当比例的农产品出售，并依靠市场交易取得日常消费品”，起初可能只是个别区域内之间发生的交易，后来逐渐发展为不同区域之间的贸易，甚至是进出口贸易。当商品经济以其最大幅度扩散至中国乡村之后，各地乡村、市镇、中小城市、商业大都逐渐在清初形成全国统一市场。

在明清中国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舞台上，中国商人以其独特的贸易方式成长起来，他们突破了传统乡土观念的局限，远离故乡四处贸迁；同时他们又极为重视乡土观念，以乡土为纽带，集体从事远距离长途贩运活动。商人远离故乡到百里、千里之外的异乡谋生、致富，然而异乡求生、求富之路布满荆棘，语言不通、习俗相异，甚至还可能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和矛盾，这些问题需要得到同乡或熟人的帮助才能解决。于商人而言，他们还会遇到另外的问题：明清中国国内市场进一步拓展，商品流通量大，但流通距离较远，交通运输条件有限；商业经营活动中，牙行欺压和官吏盘剥的现象常有发生。因此，无论是商人还是其他工匠、学徒、劳工等个体的有限力量，已难以应对其事业的拓展中遇到的风险，为了适应生存及业务发展需求，他们将乡土观念外延化，以“地缘”“籍贯”为纽带，在异乡建立祠庙会馆。会馆的

[加]人正民主编，[美]罗威廉著，李仁渊、张远译：《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24页。



建立，为商人工匠等群体提供了一个固定的祀神、联谊场所，以及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制度的联系和互助平台，他们以会馆为平台推进各自在异乡的生活、工作，并在当地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该说，会馆是中国第二次商业革命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会馆越密集。

中国第二次商业革命终结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以后中国在前面一个多世纪的高速发展中所遇到的社会经济问题凸显出来，并且随着西方国家的商业殖民活动向亚洲的迅猛推进而愈演愈烈。在 19 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中商业被中央政府提升到富国强兵所依赖的经济支撑的高度，但是滞后的国家体制、不健全的商业环境、缺失的国家保护，使得中国商业没有再次出现繁荣发展的现象。相反，面对外来商人势力的进入，中国商人感到事业拓展异常艰辛，为了生存，他们在地缘同乡会馆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同业商人团体组织的建立，垄断本地行业贸易，抵御外来竞争者势力。当然，在一些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商人早在清初就因业务需要建立了同业商人会馆。

中国古代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农业不仅关乎民之所食所用，还是国家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清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影响农业经济的基础地位，在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的同时，许多地区的农民、流民由于在故乡没有土地或土地过少、天灾人祸等原因而陷入生存困境，大肆向外迁移到有土地的地方谋生。除了清兵入关后发动的对腹地及边境地区的统一战争而造成的移民之外，此后西南、东南以及台湾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农业移民活动，如清初的西南地区有湖广填四川以及改土归流以后湘西、黔、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并且都较具影响力。这些农业移民结同乡人而聚居，形成了一个在异乡的“同乡村”，并在其中建立了一所所祠庙会馆，以系乡情、联乡谊为己任。

3. 云南会馆

在明清会馆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其社会经济发展亦与会馆有着密切联系。在以往人们的认知里，云南总是与偏僻落后、交通不便、瘴乡穷壤这些字眼相连，似乎与商品经济、



发达、会馆没有太多联系。但事实并非如此，云南与缅甸、越南、老挝等国毗邻，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云南很早就与南亚、东南亚地区市场发生了贸易联系，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区。14世纪明朝建立后，云南特殊的战略地位促使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它的开发力度，大规模军事屯田、移民以及民间自发商业活动有序进行，云南经济社会逐渐“对内”开放，云南与邻省以及内地各省的联系逐渐增多。到了18世纪，云南在中国的第二次商业革命中获得了长足发展，与内地省份的联系日益紧密。这是由于在第二次商业革命期间，商品经济向广大乡村地区扩散，但乡村市场的小额交易中，人们经常使用铜钱而非白银，使得铜钱成为市场上被大量使用的货币，铜则是需求量较大的铸币原料。与市场对铜矿资源的高需求相反，铜矿供应量严重不足，导致清初中国市场上曾多次出“铜荒”现象。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政府限制国内铜矿资源的开发，二是洋铜采买量受限。中央政府为了解决铜矿短缺问题批准开发云南边疆的铜矿资源。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下，云南矿业尤其是铜矿业蓬勃发展，成为全国的铜矿工业中心，每年有上百万至千万不等的铜矿从这里运销到京城及其他省份。在清代云南铜矿开发的历史舞台上，来自江西、湖广、四川等省的大批内地商贾远赴云南开采铜及其他矿产。矿产的开发又吸引了大量邻省及内地穷民到云南佣工，采矿所需器具、工人所需生活用品均需贸易商人贩运至乡村或厂区售卖，商品经济在云南乡村迅速扩散。于是投资商、贸易商、工人、劳工大量聚集云南，并在云南矿区、商城镇、市镇兴建会馆，清初云南矿区、商业区的移民社区生活与移民会馆的建立息息相关。随着矿业、商业的发展，人口的不断迁入，云南荒芜的田地、山林成为穷苦移民的另一理想居住地，在滇东北、东南的川滇、粤滇边界地带，聚集大量农民以及矿工，并在这些地区建立新村落，建立会馆。清初云南移民的乡村社会生活也与会馆有着紧密联系。

（二）研究意义

云南会馆是明清时期的一种民间社会经济组织，它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祠庙建筑文化。会馆在建设、发展过程中，成员或为了纪念先



贤们对会馆建设做出的贡献，以昭后人信实，或为了记录成员共议的乡规、行约，将会馆捐建缘由、捐建人员名录，乡规、行约形成或发布过程、内容，以及其他与会馆相关的事件（如会馆买卖田地、设立慈善会等）刊刻于石碑上，竖立在会馆建筑墙面上或会馆建筑内某个地方，或将他们记录在会馆志上，保存至今。这林林总总的碑刻或文献记录，为我们生动描述了云南会馆的各种面貌，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清代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因此，我们研究会馆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厘清会馆的具体建立、运作情况，还在于通过会馆组织了解清代云南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形。

1. 了解清代云南移民与清初工商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在云南矿业发展的带动下，移民云南成为清代中国移民史上的重要内容，从事矿业生产、商业贸易是移民到云南后的最主要经营活动。时人常谈及在滇开矿、贸易，佣工者大多为江西、湖广、四川、贵州等省人，他们与清代移居其他地方的移民一样，在云南城乡聚乡而居，建立会馆，为他们的工作、生活服务，本书将在相关章节详细论述会馆与云南工商业发展的关系。开荒种地。清初，随着云南农业的恢复，许多荒地重新得到开垦，矿业兴盛后，移民人口增多，山林、荒地的开垦速度加快，开垦规模扩大，垦殖农民中有许多是来自外省的移民。有的垦荒移民亦为矿厂工人，厂旺时到厂佣工，厂衰时便到当地或其他地区开荒生存；有的垦荒移民则是专门到云南开荒的，他们也是会馆的成员之一。由此可以肯定会馆与农业移民之间的关系匪浅，遗憾的是笔者收集到的会馆资料尚未涉及乡村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但通过会馆，我们是了解到清代云南内地移民在云南的工作、生活状况，也可以了解到清初云南工商业发展的实际运作情况。

2. 了解清代云南的国内国际贸易发展状况

18世纪，云南工商业发展处于巅峰时期，云南本土商人也开始向外移民，并在他们的移民地建立会馆。云南人秉承了他们地域上的优势及由此而形成的商业传统，将他们的商业拓展重点区域放在了境外——缅甸，同时也将当时中国国内兴起的商业组织会馆带到了缅甸曼德勒、



金多堰等地，会馆成为这一时期云南向外发展的历史见证。当然，国内的北京、宜宾等少数城市，也出现了云南商人修建的会馆，他们以会馆为平台，推动了云南与内地省份的商业贸易联系。通过会馆，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代云南的国内、国际贸易发展状况。

3. 了解晚清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18世纪末，中国第二次商业革命结束，商品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云南矿业发展也从高峰期转入低谷期，这种低速发展状态持续了几十年也未能好转。更不幸的是，19世纪中叶，云南发生了动乱，战争致使云南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人口大量外逃或死亡，会馆组织临时解散。战争结束后，云南在西方殖民者全球商业活动过程中沦为英法殖民者的目标，他们迫使清政府开放腾越、蒙自、思茅、昆明为商埠，开通红河水道为对外商道，修建滇越铁路，外资、外商挤入云南，云南商品经济发展面临着较以往更深的“对外开放”。这些变化使云南商人在获得拓展贸易机遇的同时，还需应对更激烈的商业竞争，甚至是不平等竞争。他们再次推进了新的行业会馆的建立和同乡会馆的演变，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通过这一时期的会馆，我们可以了解到晚清云南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二、研究回顾

自19世纪80年代美国人对中国会馆、公所进行调查开始，学术界对中国会馆史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至今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迄今的一个多世纪里，学者们对会馆研究的重点各有不同，本书将分三个时间段对国内外的研究进行回顾。

（一）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

19世纪80年代，一些欧美人士到中国后发现当时的中国商人正借助会馆、公所与外国商人进行竞争，便对中国工商性质的会馆、公所



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对北京及其他商业城镇的工商会馆展开调查。如麦高文（MacGowan）、马士（Morse）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会馆、公所与欧洲的基尔特（guild）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认为这就是行会，并用“guild”一词来翻译它。欧美学者在调查时，将中国工商会馆与西方行会进行了对比，找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共性，但并未注意到中国工商会馆的特殊，这也导致后来学界对“会馆是不是行会”这一问题争论不休。

20世纪初，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中国的大旅行调查中，对中国各地的会馆进行了调查，并将相关调查资料收录进《支那别省全志》和《支那经济全书》。以仁井田陞为核心的研究团体开始对中国北京的工商业会馆、公所进行了集中调查，收集整理了《北京工商基尔特资料》，展开了对会馆的长期研究。其团队成员和田清发文《关于会馆公所的起源》指出中国会馆、公所的起源可追溯至唐宋的“行”，是商人经济组织。与欧美学者相似，和田清接触到的大多为晚清中国工商业行会、公所资料，他在关注会馆、公所缘起的商业组织性质时，忽略了会馆最初的移民同乡社会组织的属性。

鉴于国外学者对中国会馆、公所的片面认识，国内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1925年，郑鸿笙发表了《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一文认为会馆并非西方的基尔特组织，公会、会馆、公所这三种社会团体之间有着微妙区别，会馆与一般的社会团体不同，它具有财产团体和公益团体的双重性质。郑鸿笙的研究植根于中国社会，他对中国会馆、公所、公会的认识更为客观，注意到了会馆的双重属性。

但是，此文并没有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和共鸣。1927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唐宋时代的商人组织——行》一文，提出与和田清相

MacGowan, D. J. (1886) Chinese Guilds or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rades Unions.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1: 133-192. Morse, Hosea B. *The Guilds of China*, Shanghai: Kelly & Wash Ltd.

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7年版，第14页。

郑鸿笙《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括》《国闻周报》第2卷第19期，1925年5月18日，第19-21页。



似的观点，认为作为会馆先驱的行在唐宋时代已经存在。1928年美国学者伯杰斯（Burgess）在《北京的行会》一文中的观点与先前的美国学者以及日本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1928年，日本学者大谷孝太郎撰文《上海的同乡团体及同业团体》，指出近代上海商人团体的发展，时间越靠后其乡土结合越凝固，这种乡土结合实际上是在分割市场，阻碍了资本的聚集，该研究的立足点依然是会馆为西方基尔特组织，不过他注意到了会馆等商人团体乡土结合的特性，却对商人团体所发挥的功能阐述不够全面。

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会馆、公所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首先，在会馆是不是西方行会的问题上，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否定了早期关于会馆就是西方基尔特的观点。1934年，全汉昇所著《中国行会制度史》一书问世，他在该书中论及明清时期的行会制度时，用的章节标题为“会馆”，肯定了明清会馆的商业行会组织的属性，但他指出其与欧洲的行会有本质区别。同时，该书明确了乡土观念在会馆源起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且指出会馆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应对客居者在生活、事业中遇到到诸多困难，它还具有同乡团体的性质。此外，该书还对客帮与会馆的联系、会馆的内部运作、事业活动等做了详细的分析。该书虽然不是有关明清会馆的专著，但是作者对明清会馆的认识较为全面深入，是这一时期会馆研究的代表性成果。1935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对会馆有了新的认识，他在《论唐宋时代的商人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一文中对中国唐宋至清代的商人组织做了详细的考证，并将这些组织与会馆、公所进行了一一比较。他认为，欧美学者将中国会馆视为西方的基尔特，“但是相当于基尔特的却是行”，“所谓会馆是明代嘉靖、隆庆以后，集中在北京的各省官吏、士子等按照乡籍的差别而设置的憩息燕集场所，似乎北京以及各省的商人会馆也是

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7年版，第14页。

John Stewart Burgess, *The Guilds of Peking*, New York, 1928.

[日]大谷孝太郎：《上海的同乡团体及同业团体》，《支那研究》，1929年第19期。

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5年版。



模仿这种性质的。……商人会馆的发生，难以说是本地的行发展壮大的必然的结果，而显然是因为和其他都市的通商关系密切起来，其他地方的商人定居下来的人有所增加，也就是商业更加发展的缘故”。1942年，他又发表《清代北京的商人会馆》一文，进一步澄清了会馆与工商业行会的区别，阐述了行商、坐贾以及商业发展与会馆的关系。

其次，国内外学者对会馆研究的视角也在逐渐拓宽。1932年，根岸佶发表了《支那的行会》，将会馆研究视角从探讨会馆是否是西方行会，转到研究会馆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政府将部分管理经济的能力让渡给了商人。1945年奚季良拓宽了会馆研究范畴，他在《同乡组织的研究》中从同乡组织视角对四川地区的移民会馆展开研究，使会馆研究范畴不再局限于工商业性质的会馆，该研究堪称会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一阶段，学界研究的主力军为欧美、日本学者，研究的焦点为清末民初的工商性质的会馆。学者们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收集了许多会馆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会馆的起源、会馆与西方行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对中国会馆最直观的也较为片面的认识，但这种认识随着他们对中国会馆研究的深入而变得更加客观。中国学者研究会馆的成果不多，但他们的认识较国外学者更为客观，研究亦较为深入。

（二）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这一时段，研究会馆的队伍不断壮大，不过国内、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稍有差异。

日本学者关注的焦点仍为中国工商会馆，但研究路径日益拓宽。

[日]加藤繁：《论唐宋时代的商业组织“行”并及清代的会馆》，《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日]加藤繁：《清代北京的商人会馆》，《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卷，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7年版，第16页。

奚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南京：正中书局，1943年。



根岸佶实地考察了中国上海等地的工商行业会馆，著有《上海的行会》和《中国的行会》两书，其视野仍集中在工商性质的会馆，但是他对



会馆又做了一般性的全面研究。

仁井田陞对会馆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中国的社会和行会》一书中，他继承了日本学者对中国工商行会性质会馆的经济史研究，指出应将中国的基尔特组织与西方行会组织做比较研究，为深层次把握中国会馆的特质，应先理解中国社会的内部构造，从而将会馆研究向社会史方向拓展，这是日本学界在会馆问题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此外，仁井田陞收集的会馆碑刻等资料由后辈学者整理汇编为《仁井田陞博士辑北京工商基尔特资料集》，7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今崛诚二是另一位在会馆研究方面成果较多的日本学者，他先后发表了《行会史》《河东盐业同业公会的研究》《中国行会商人的构造》等论著，集中探讨了工商业行会、会馆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泽崎坚造、横山英、宫崎市定、幼方直言、白山反正、增井经夫等发表了关于中国行会、会馆的论文，其内容涉及会馆属性、作用等传统问题。

欧美学者关于中国史的研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学派，一派以欧洲中心论为出发点，将中世纪欧洲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应用于中国，在会馆研究上他们将中国的会馆视为欧洲中古社会的基尔特行会组织，忽略了会馆、公所的时间差异和区域差异，并认为会馆、公所的市场垄断权力十分强大。如，1983年蒂莫西（Bradstock, Timothy R）发表了《清代中国的手工业行会及其垄断》，认为中国的手工业行会与欧洲中古社会的行会相似，在市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垄断作用；1988年，刘广京（Liu Kwang-ching）发表了《中国的商人会馆：历史疑问》，认为行会类似于西方的基尔特组织，并指出行会和同乡会馆反映出商业

见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7年版，第16页。

见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7年版，第16页。

[日]佐伯有一、田仲一成：《仁井田陞博士辑北京工商基尔特资料集》，东京：东洋文化研究所1975—1983年版。

见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2007年版，第16页。

Bradstock, Timothy R.(1983). Ch'ing Dynasty Craft Guilds and Their Monopolies.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4(12): 143155.



互动的私有化。

另一派则脱离欧洲中心论，客观地看待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他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及中国社会的行会或会馆，如何炳棣、施坚雅、罗威廉等。美籍华人学者何炳棣于1966年出版了《中国会馆史论》，他在该书中对中国会馆的起源做了考证，指出会馆最早出现于明永乐年间，为旅京官僚团体所建。他认为“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狭义会馆是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会馆是指同乡组织”。他还特别指出北京的同乡会馆具有作为考生寄宿地的特殊功能。同时，他依据文献记载对中国京城、大中小商业城镇的会馆做了梳理，指出中国存在不同类型的会馆，并首次对会馆做了较为全面的界定。美国学者施坚雅开创了“中心地方”模式，他在其著作《中国帝国晚期的城市》中，从客居的角度论述了城市中的同乡会馆，认为城市中的客居是以忠于乡里原则为基础的，并因客居的同乡组织而受到推动。北京和各省会的同乡会馆在科举，入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他经济中心地的同乡会馆是“垄断式控制职业位置之争的表现”。继施氏之后，另一位美国学者罗威廉秉承了施氏中国史的研究视角，以清代中国著名商业都市汉口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汉口城市中的会馆或行会，他认为“会馆既指一座建置，也指占有它的组织。会馆是一个永久性地缘组织的驻地”。会馆不仅与汉口城市商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还与城市社会的其他领域，诸如慈善、治安管理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受史学研究“五朵金花”的影响，对会馆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主义萌芽论相结合，开展了关于会馆概念、性质界定的激烈讨论。以雷大受、吕作燮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的

Liu, Kwangching.(1988). Chinese merchant guilds: An historical inqui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7(1): 123.

[美]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1页。

[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43页。

[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蓉、鲁西奇译，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312页。



会馆不等于西方的行会。雷大受在《漫谈北京的会馆》中提到，北京的会馆创设之初其目的在于联系同乡情谊，北京的会馆性质大致有二：一种是工商业者的行会；另一种则是专为应试仕子解决住宿问题而设置的。可以说，他对北京的会馆一分为二地进行了客观阐述。吕作燮在《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中指出，中国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且早期会馆与工商业毫无关系，北京、上海、苏州、汉口等地会馆资料显示，会馆多为地域性质同乡组织或行帮组织。之后，他又相继发表了《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和《南京会馆小志》两文，进一步指出会馆是地域观念的组织，其成员有官员、工商业者、农民等各色人等，而公所是同业组织，成员仅为工商业者。

以胡如雷、洪焕春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中国的会馆就是工商业行会组织。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中指出，“明清之际，我国才真正形成了类似西方行会的工商业组织，或称会馆、或称公所、或称行、或称帮”，即会馆、公所是工商业组织。此后，洪焕春的《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和作用——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之一》、顾延培的《上海最早的会馆——商船会馆》、贺海的《北京的工商业会馆》、汪士信的《明清商人会馆》，均表达了相同的见解。1987年，李华也在《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一文中，区别了北京仕

雷大受：《漫谈北京的会馆》，《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4期。

吕作燮：《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吕作燮：《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中国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2期。

吕作燮：《南京会馆小志》，《南京史志》，1984年第5期。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1页。

洪焕春：《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和作用——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之一》，《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顾延培：《上海最早的会馆——商船会馆》，《中国财贸报》，1981年5月16日。

贺海：《北京的工商业会馆》，《北京日报》，1981年11月27日。

汪士信：《明清商人会馆》，《平淮学刊》，1986年第3期。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子会馆和工商业会馆，但他认为北京的工商业会馆是一种封建组织，阻碍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学者受会馆就是工商业行会组织观点的影响，还专门整理、汇编了相关工商业会馆碑刻资料。如彭泽益编著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收录有关手工业公所、会馆资料；李华编著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收录了北京工商性质会馆碑文；苏州历史博物馆编著的《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收录了苏州工商性质会馆的碑刻资料；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等编纂的《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也收录了部分工商会馆碑刻资料。

这一时段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仍在持续关注中国工商性质的会馆，但研究路径已经拓展。由于国内学者对会馆的研究晚于国外学者，故当国外学者已经从探讨会馆与行会、基尔特之间的同异转向探讨会馆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时，中国学者还在集中讨论会馆与行会、基尔特的异同。总体上会馆研究的地域范围仍然集中在北京、上海、苏州、广州等工商业非常发达的城市。

（三）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经过 1880 年到 1980 年近一个世纪对会馆的研究、探讨及认识，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学界对会馆研究的视角和思路不断创新，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研究日益理性化、全面化、深入化。

日本学者关于中国会馆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研究焦点从关注会馆的基尔特性质转到探讨会馆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川胜守在《明清时代的北京、苏州、上海之广东会馆》中，率先应用会馆的地域分布强弱来分析地域性商帮在某地实力的强弱，指出商人会馆是对士大夫会馆的一种模仿，并通过会馆分析了明清社会变革中商与士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

苏州历史博物馆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的关系。寺田隆信在《关于北京歙县会馆》中指出，北京的歙县会馆主要是为服务于科学而建立的，但是在会馆发展中商人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将会馆问题与科举、商业资本问题联系起来，使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展。

欧美学者受社会整体研究史热潮影响，将中国会馆研究置于大社会背景下，注重会馆与其他社会单元的联系，对会馆的认识更加客观。如1992年罗威廉发表了《明清会馆》一文，提出中国会馆“复合结构”论，即认为会馆兼有同乡、同业组合的双重结构。2009年，莫尔·马塔（Moll-Murata.C）发表了《17至20世纪的中国行会概述》一文，认为中国的会馆类似西方的基尔特行会，并对中国会馆、公所的研究现状做了概述。

国内会馆研究队伍愈发壮大，在会馆的性质、功能等基本问题研究，会馆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会馆资料收集整理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关于会馆性质、功能的研究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他们注意到了同乡与同业的会馆、公所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客观地分析了会馆的“双重结构”。如徐鼎新认为上海的同乡会馆与行业公所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同乡会馆表现出同行业组合的特点，同时同业公所中又包括若干地域商帮。王笛认为重庆的会馆、公所和同业行会也体现了同乡与同业双重组合的结构特征。会馆不仅是同籍移民举办各种社会活动的场所，也对城市政治、宗教、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它几乎参与了城市管理和建设的各项事务。王日根认为“会馆与公所在很多

叶显恩主：《清代区域经济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日]寺田隆信：《关于北京歙县会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Rowe, William T.(1992). Ming Qing guilds. Ming Qing Yanjiu, 1: 4760.

Moll-Murata. C .(2009). Chinese Guild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An Overvie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3.

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5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社会与社会发展》，《城市史研究》第5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场合往往不易区分，倘若真要说出二者的区别，其主要点当在于：会馆往往较多地讲究仪貌，公所则更多地注重实效。……公所往往是中小商人谋求发展的处所，会馆则往往是大商人跻身于仕途或攀附仕途的根据地。而中小商人则既可栖身公所，又可寄居会馆”。邱澎生认为“无论会馆公所或商会，这些苏州商人团体都是一种民间结社。他们有一定的结社宗旨，也有正式的内部组织章程，因而也是一种社会组织。”范金明认为，对会馆与公所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别对待，“会馆和公所都有地域性和行业性两类”“会馆与公所不但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而且在产生时间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先后”。方志远认为“会馆与公所是一种递进关系。会馆是起始的名称，公所是继起的名称。但是会馆是聚会之所，叙的是乡谊，气氛宽松；而公所是公议之所，议的是利益，气氛严峻。”上述观点，均有资料可以证明其合理性，但又难以涵盖所有会馆、公所的关系，因此要客观辩证地看待不同地域的公馆、会所。正如严昌洪指出“不应以会馆或公所的名称来区分这类社会组织的性质，应该按各个组织的组建动机、人员构成、活动内容来确定其性质，是同乡会还是行会，是商人组织还是手工业组织，或者兼而有之”。

会馆与商会之间的关系，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起初，学者们重在强调会馆与商会的区别，否定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如朱英明认为，会馆与商会是明显不同的两种商人社团。丁长清也认为会馆与商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商会与会馆不同，已不是以地缘为纽带组成的

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68-69页。

邱澎生：《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台北：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5年，导论。

范金明：《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方志远：《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4页。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朱英明：《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